

中國變 香港怎能不變?

2017 年到了最後一個星期，過去一年，香港的教育領導由局長吳克儉和常秘黎陳芷娟，已經換上楊潤雄和楊何蓓茵；再高層的特區首長也由「可能連任」的梁振英變為林鄭月娥，可謂人事上有了很大的改變。

反映官方意圖

放眼神州，以共產黨十九大作階段而論，雖然說政治局常委 7 個換了 5 個，但仍是習近平作強勢領導，國內政治社經局面也會依過往 5 年的趨勢繼續發展。那麼要說變，是中國不變而香港會變。可是，中國不變的是持續過往 40 年的改革開放，再加上近 5 年的「新時代」起步，亦即是「持續的變」已是常態，步向兩個「百年使命」：2021 年共產黨建黨 100 周年以前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；以及於 2049 年中共建國 100 周年以前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。

又回到香港，所謂人事大變，又會不會只是「流水的官、鐵打的衙門」，政務常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？

中國的教育，多年來的發展已累積大量高質素的中層技術力量，加上已發展到「應試+素質」合一的優秀人才，便收成了科技基建等舉世注目的成就。很多評論者詬病中國教育的優秀學生外流：2016 年，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 54.45 萬人，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 43.25 萬人，比例為 79.43%，相對於 2007 年的 30.5% 已是大大改善。

不過，驟眼看，仍是出多於入，若考慮出國與歸國的時滯情況，即 2016 年的歸國畢業生會是 2012 或 2013 年的出國者，如此計算之後，則從 2011 年開始，留學生回國人數便開始大於出國人數，促成「人才順差拐點」。人才的回歸不只在數量，在不同的尖端領域都有海歸精英加入，典型例子是 8 名哈佛博士後「集體歸國」，成為「八劍下哈佛，共聚科學島」佳話。

再看基礎教育的改革。本月，中國教育部印發《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》要求各教育領導單位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工作；在義務教育過程，堅持免試就近入學原則，不舉辦任何形式的人學或升學考試；不得提前招生、提前錄取；控制考試次數，考試成績不進行公開排名，不以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。

雖然國內的教育政策與實施會有不同大小的差距，但是政策的制訂，總反映出官方的意圖，依然值得參考。

校長也難應付學習差異

回到香港教育，在新世紀的教改中，確實在保持普遍高水平學習成果之餘，活化了小學教學，加上家庭及社會不同的教育資源投入後，不少優秀的小學畢業生真的是品行、學業、活動三者並進；若以學能而言，幾可達到一般中學的中二三的程度。

可惜的是，這批小學精英一到中學，大多數便回歸「正常」的 Form One 子女，迫着做早已學懂的功課、由小學領袖變成中學「小嘍囉」，終於削尖歸於平庸。當然，這情況上世紀的香港學校也曾出現，但現時的情況更加惡劣，有些中學校長也向我表達難以應付這類學習差異。

由5年中學加兩年預科的分流精英制，改成現時6年中學的一致學習模式，筆者在當年「新高中改革」草擬時，已提出此等學制不利兩端的發展：傳統學科能力低的學生被「拉牛上樹」（再重複一次：牛是毋須上樹的）、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困於文憑試的平庸要求。

結果至今，效果已現——弱勢學生在學習能力最強階段被迫學非所用，得出厭學棄學，構成日後「終身學習」的障礙；強勢學霸的文憑試狀元幾乎全投醫科，相對於中國大陸出現的耶魯大學海歸高材生到農村當村官，雖然可評為標準樣板，但我們卻連樣板也是難得呢！

好了，這批也算中學精英到了本港的主流大學，便遭遇更大學習異化的環境——教學效能參差、港生學習態度怠慢、畢業前景茫茫等等。再與來港就讀的內地生比較，自愧學能勤奮不足，或成了「認衰易做人」的心理常態，又如何在這人才競爭的地球村出人頭地。

當中國大陸的人才變得愈來愈多、愈來愈強，曾經站在教育人才前端的香港卻是「不進則退」。在香港的「新時代」，我們還只是在研究所謂「八大教育範疇」【註】這些微觀修補。研究一輪，我們可能是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人家卻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。

許為天 教育大學客座首席講師

註：八大教育範疇：一、教師專業發展；二、課程安排；三、評核制度；四、職業專才教育（職專教育）；五、自資專上教育；六、校本管理；七、家長教育；八、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

#許為天 #時事評論 - 中國變 香港怎能不變?